

1748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杨春华 张道庆译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新华出版社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杨春华 张道庆 译 周爱琦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杨春华 张道庆译 张 开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 华 社 印 刷 厂 排 版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70,000字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203·005 定价: 0.71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作者阿·阿夫托尔哈诺夫1979年的新作，是一部全面介绍勃列日涅夫统治内幕和特点的著作，被称为当前西方“第一本认真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品。

书中以大量事实剖析了勃列日涅夫十多年来的内外政策和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认为苏联对内已成为“军事警察农奴制国家”，对外成为最危险的新型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分析了勃列日涅夫打击异己、培植个人帮派以及勃列日涅夫私人势力的情况，揭露了“特权阶层”和苏联当前国内阶级的状况，说明了勃列日涅夫当前在争取独裁统治方面所遇到的重重困难，阐述了克里姆林宫在争夺勃列日涅夫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和各派势力的政治背景，预测了苏联国内发生政变和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以及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也分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扩张发展新阶段和新战略的实质与特点。

书中个别地方略有删节。由于作者本身所处的立场，有些观点存在问题，请读者分析鉴别。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

播种出版社对于作者的介绍

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生于高加索。切禅族人。曾担任联共（布）中央负责干部名册的工作人员。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研究俄国历史。

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1942年，经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释放。1943年移居西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俄国历史教授。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苏联国内写了六本书，主要是谈切禅和高加索的历史。本书是他在国外写的第十本书。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弱点》（政治评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作者以他特有的分析能力剖析了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15年统治时期的内外政策。当这个时期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委员年事高迈这一正常的生理原因而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这本书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文学”作品——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小地》、《复兴》和《垦荒地》）。这些作品对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是颇有价值的。

这是第一本认真分析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维埃政权的书。

代 前 言

一个大阶级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首先应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人，他一旦掌握国家大权，必然要推行他自己的意志和纲领。但是，哪怕是最超群出众的高级官僚，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仍不免是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苏维埃国家的前三任领导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独特的政治家。目前，苏联超级大国的第四任领导，已经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超级官僚，他就是勃列日涅夫。他步其前任的后尘，继承他们的衣钵；又是把党的机关、政治警察和军队三位一体的现政体的意志付诸实施的执行者。这是他个人权位迄今无恙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作为政府首脑和党的领袖的权力变幻莫测、软弱无能的表现。

列宁早就预见的革命者的制度蜕变为官僚主义者制度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完成了。苏维埃国家变成了苏联专制官僚政治的庞大机器。由于官僚们的思维方式缺乏真正政治家的创造想象力，所以，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要么避免提出和解决对内政策上的尖锐问题，要么加紧其全球扩张的对外政策来掩饰这些问题。在这方面，积习很深的苏联官僚们的创造想象力却并不匮乏。克格勃的智囊团念着“缓和”经，在西方高枕无忧的情况下，让契卡连人带思想都合法地渗透到了自由世界的各个组织和机关，人们对苏联意识形态的侵略不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苏联对东欧各国人民的奴役长期固定化了，契卡分子资助和武装的“解放战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热带密林中的“苏联兄弟”的“革命政变”有了合法的权利。在这种“缓和”的幌子下，西方的贷款、

技术和工艺源源不断地流入苏联，使克里姆林宫不仅能够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维持庞大的军队，而且能推迟它由于饕餮的军事机器而不断面临的 经济 破产。

我无意于撰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政治传记。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乏味、更徒劳无益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生涯可谈。因此就连那些苏联传记作家在写到他的《生平事迹》时，一共只用了 3 页到 4 页的篇幅来写勃列日涅夫本人，而其余篇幅是用来描写党的机关。至于那些西方政论家，到目前为止已写过几本关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的书，却还根本没有动手去写勃列日涅夫。当代人如此这般地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于一个大国的头头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不敬。不过，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本身却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因此，本书力求分析这一任统治历史形成的特点、它同几位前任的异同之点以及他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我的《政治评论》能引起读者一些认真的思考，我将感到欣慰。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代前言

第一章 对内政策	(1)
一、勃列日涅夫的统治.....	(1)
二、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剖析.....	(41)
三、苏斯洛夫是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 员.....	(48)
四、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65)
(一) 新风格.....	(65)
(二) 经济方针：新斯大林主义.....	(69)
(三) 党与社会.....	(77)
(四) 新宪法.....	(83)
(五) 莫斯科式的缓和.....	(87)
五、勃列日涅夫的宪法.....	(95)
(一) 一党专政法律化.....	(96)
(二) 从联邦制到一体化.....	(99)
(三) 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基础.....	(102)
(四) 列宁论联邦制.....	(104)
(五) 苏联式的公民权利与自由.....	(107)
(六) 违反宪法精神的“成熟社会主义”.....	(109)

六、克里姆林宫的教条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	(113)
--------------------------	---------

第二章 对外政策..... (126)

一、克里姆林宫扩张政策的新阶段.....	(126)
二、苏联帝国主义的发展.....	(150)
三、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与西方的顽症.....	(167)

第三章 评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录..... (175)

一、《小地》.....	(175)
二、《复兴》.....	(189)
三、《垦荒地》.....	(199)

结束语：革命会威胁国家吗？.....	(213)
--------------------	---------

第一章 对内政策

一、勃列日涅夫的统治

假如西方记者一再传出的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患了绝症的预言实现的话，那么他在最近五年里起码已经死过五次了。但是，对这种事情十分敏感的克里姆林宫，并未对西方“预言家们”就自己领袖的健康散布“流言蜚语”而加以指责。恰恰相反，关于总书记身体不佳的谣言是契卡人员自己向西方透露的，而勃列日涅夫在访问西方（赫尔辛基、巴黎和波恩）时的举止也使西方政治家们确信，他们所接触的这个国家首脑大概活不长了。迄今，历来的外交手腕不过是玩弄“外交病”而已。但是，克里姆林宫却表明，搞一点“外交死人”的把戏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当然是预先就有所打算的：“赶快同克里姆林宫快死的“鸽派”签订条约吧，不然明天就将是鹰派”的世界了！赫尔辛基会议就是在这出戏的高峰期间产生的，这次会议给了莫斯科想要的一切，而西方却一无所获。尤其是，克里姆林宫把赫尔辛基会议变成了诱捕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陷阱。他们有些人仅仅是由于要求履行赫尔辛基会议关于人权的决议，不是押进监狱，就是驱逐出境。

国内的“预言家”也把勃列日涅夫看错了。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连那些有一般思考能力的公民都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权长不了，是个“过渡性”的东西，这倒并非由于他的健康状况

况，而是由于他的“平庸”与“无才”。但是，大家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的缺点的东西——“平庸”，却恰恰成了他的优点。正是由于这种“平庸”之道才能领导集体的专政。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然而，人们看错了。勃列日涅夫却已经统治了十五个年头。他的政治生命如此久长，当然自有其原因。他认真研究了斯大林使用权术的成就和赫鲁晓夫作为“唯意志论者”而遭到失败的教训。1964年10月，一些阴谋家把赫鲁晓夫推下了台，他的主要罪名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如果把党的这个哲学术语译成党的政治语言，那么赫鲁晓夫的罪状是破坏了“列宁关于集体领导的准则”，独断专行，不是对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而是凭他的感情冲动行事。因此，他在对内政策上的许多决定是漏洞百出的，自相矛盾的，而且危及到斯大林所创建的政权制度的存亡。（揭发斯大林，在工业管理上搞“地方分权”，改组党的结构，在各级党组织直至政治局实行领导成员定期轮换的原则等等。）毫无疑问，在对外政策上，赫鲁晓夫也受到了批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的许多决定被认为是轻举妄动，甚至是冒险主义，因为它缺乏深思熟虑和物质上的准备（柏林问题上的最后通牒、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冒险行动、中断“四大国”的巴黎会晤等等）。中苏关系紧张的责任也可能归咎于赫鲁晓夫；这一点可以用赫鲁晓夫倒台后立即开始同中国对话（苏中两国政府首脑会晤）来证明。应当承认，从国内制度的根本利益和对外全球扩张政策的战略战术任务来看，阴谋家反对赫鲁晓夫是完全正确的。克里姆林宫在赫鲁晓夫垮台后作出的主要结论见之于宣传提纲：今后党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都应立足于严格的科学态度上，立足于分析情况的科学方法上。尊重科学，这是时代的潮流。这个提纲的合理内核是，最上层作出的

任何一项决定，都必须在政治上、精神上，更主要的是在物质上为其顺利实现具备了先决条件之后方可通过。回顾历史的做法也是可取的：由列宁创建、并由斯大林加以完善的苏联政权体系，是以国治人，以党治国，以党的机关治党。因此，这个制度过去和现在都经受住了各种外来的政治考验，但是，如果人们对它的历史罪行的合法性和它那一度稳定的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话，它就濒于崩溃的边缘了。赫鲁晓夫连续不断地进行试验（从揭发斯大林直到无休止的“组合”和“改组”）使整个制度面临着瓦解的威胁。在赫鲁晓夫时代，国内产生了新的气氛，苏联人开始从国家政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国家本身也开始从党的无所不在的鹰爪下解放出来。当然，这并非出于赫鲁晓夫的心愿，而是他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客观结果。这是不能容许的。归根结底，是国家和普通人得了好处，党和党的官吏吃了亏。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的门徒出于高度发达的自卫本能，预见到自己的新导师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是起来搞掉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接任的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统治的经验中得出了最清醒的结论。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本政策）对他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赫鲁晓夫让年轻的新干部代替保守的老干部，这个政策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他做得不慎重，草率从事，而且虎头蛇尾。

早在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时，赫鲁晓夫就犯下了他那个制度下最致命的错误：他让第一次反对自己的阴谋参加者留作自由人，从而注定了他垮台的结局。假如他当时消灭了1957年6月阴谋的参加者，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1964年10月的阴谋。十月阴谋的参加者们确切地知道，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成仁，至多是告老退休而已。

他犯下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他破坏了斯大林行之有效的制度（即通过秘密“内务办公室”的“特工局”来监督和控制在党、警察和军队），却没有建立任何足以取代的部门。赫鲁晓夫以为，按照党章，他完全可以通过苏共中央书记处来控制党和国家。他以为，他统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会替他说话，因为当1957年恢复政治局（主席团）的时候，是书记处救了他赫鲁晓夫。但是到了1964年10月，恢复书记处的时候，他却倒了台。斯大林靠着他的“内务办公室”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须知，贝利亚及其同谋者反对斯大林的阴谋是在他们借斯大林之手破坏了“内务办公室”之后才得逞的，这一点我已在《斯大林死亡之谜》一书里作了证明。

上面提及的“干部政策”是赫鲁晓夫的第三个致命错误，而且可以说是他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著名口号“干部决定一切”并不是一句好听的格言。追根求源，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言论里找到这种思想：共产党人为了巩固已经夺取的政权，应当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全部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配备自己的新干部。众所周知，列宁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就是这么做的。当斯大林全面消灭列宁的党、建立自己的得心应手的党时，实质上也是这样做的。赫鲁晓夫诋毁了斯大林的名誉，网罗亲信，保留了斯大林的事业，即用几十年时间严格训练出来的一个耍两面派的党。不错，赫鲁晓夫清洗了这个党，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他激怒了这个党，没有防止它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他挑动了这个党，却没有防范可能发生的动乱。同时，他非常冒失地几乎同时与党内所有的实力派发生了冲突：他冒犯了契卡分子——让成千上万的契卡分子退休领养老金，他得罪了党的专职干部，想出了一个“经常不断更新的原则”，并作为准

则，用党章法定下来，他同将军们过不去，裁减军队，让他们一部分人退役，一部分人则当了国营农场场长；他还同中央的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分散”权力，把他们遣送边远地带。

斯大林在定期轮番清党方面是采取另一种办法。他搞了三次大清洗：1929年、1933年、1937—1938年。结果，从1933年的3,555,338个党员减少到1938年的1,920,002个党员。因此，有1,635,336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自动就缚。（见《党的生活》1977年第21期第21页）（我想借此机会纠正一下我过去一个不确切的数字。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材料，过去用的数字是在叶若夫时期被清除的共产党员为120万人，这个数字是通过党的各种渠道得到的。现在查明，当时被镇压的共产党员为40万人以上。）

斯大林搞清党的次序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大清洗”的次序是：从1936年夏到1937年夏，首先清理群众（在城乡进行大规模逮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三人小组”提出指控）；从1937年夏到1938年秋，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清理党和军队；从1938年底到1939年春，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上到下清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个时期，尽管清理党、警、军以及国家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全面展开的，但是没有发生危机。有远见的斯大林事先培养了大批象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流的后备干部，由他们顶了空缺。斯大林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上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50多万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和党的领导职务。”（见《列宁主义问题》第597页）换言之，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以崭新的党为后盾的崭新的政权机关。他以此保证了他的政策的胜利和他个人独裁的安全。跟随斯大林学习了20多年的赫鲁晓夫却根本

不懂得斯大林政权的这一诀窍。而隔任的勃列日涅夫却出色地掌握了它。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需要清党，过去的斯大林的党也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党。所要恢复的仅仅是被赫鲁晓夫破坏了的对斯大林统治机器的信念。因此，不仅应当停止批评“对斯大林的迷信”，而且应当停止批评他的错误。要公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就得公开取消两次党代表大会（第20大和第22大）的决议，然而当时参与其事的，除了赫鲁晓夫之外，还有现在政治局里的全体成员，这样做不仅在国内，而且会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新的混乱（同时也表明新领导的无原则性）。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以朱可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军官出面恢复斯大林作为一名卓越的统帅的名誉；让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历史文件中恢复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和列宁的学生的名誉。

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5月德苏战争结束20周年时所作的报告，便是“新斯大林个人迷信”浪潮的第一个正式信号。从20大以来的八年中（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以及苏联的元帅和将军们的口里），党和人民所听到的，是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犯了极大的错误，是战争初期由于斯大林的麻痹，或者由于他在战役问题上的一意孤行而造成了一个一个军团的溃败与毁灭，现在，人们非常震惊地听到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在约·维·斯大林的领导下赢得了战争！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官僚机构都动起来了。党中央是非常清醒的首脑机关。它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是偶发性的无的放矢。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上作出荒唐的事。一时间，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思想家的文章和元帅们的回忆录，都纷纷出笼为这个被赫鲁晓夫“搞臭了的”斯大林辩护，这是中央在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中得出了

痛苦的结论，因为把斯大林与苏维埃制度对立起来，就等于宣判了这个制度的死刑。（据说，那些年代里民间传着一句攻击苏联那些没有良心的官僚主义者的话：你们不是斯大林时代的人！这句话曾经被认为是对第20次代表大会的赞词，而今天，勃列日涅夫却会因这句赞词而把自己的公民送进疯人院。）

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绝不是为了恢复历史真面目或者恢复对斯大林的公正评价，它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给斯大林恢复名誉是为了给他的统治制度恢复名誉。这才是勃列日涅夫过去和现在所推行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本意所在。当然，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已永远寿终正寝了，但是，它的某些组成部分将会永远存在。这些成分中的许多东西已被勃列日涅夫制度加以利用。

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他的关于管理“共产主义”国家的学说，而它对列宁主义的实际贡献，就是成立“内务办公室”的思想。“内务办公室”这个名称本身，没有必要加以阐述。西方对它的叫法也很不一样，就连斯大林也没有把自己的办公室叫做“内务办公室”（中央文件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约·维·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和“特工局”）。

党和国家的各种高级合法机关（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发挥其职能作用。控制这些机关并掌握大权的是一些著名的党魁。他们签署并公布各种决议，但斯大林本人（在1941年5月以前，他没有正式担任政府职务）却很少出面。然而，他们通过和签署的决议却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不仅中央委员，而且连政治局委员也只是通过同斯大林偶然的谈话，或同他的助手的谈话，或从报纸上才知道许多以他们的名义签发的极端重要的决议。由党和国家官方机关签署的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都是以阿·波斯克列贝雪夫将军为首的斯大